



中国古代  
老学寓言故事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古代 老学寓言故事选

严北溟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鸿钧  
封面装帧 任意  
插图 程十髮

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

严北溟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338,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

书号 2074·371 定价(五) 1.25元

# 前 言

## ——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发展的历史观

走进祖国琳琅万轴的古代文化艺术宝库，我们常常会发现到处点缀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瑰宝，它就是历代丰富的哲学寓言故事——一项值得我们重视而有待于继续发掘的珍贵遗产。

这些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和宝贵的生活经验，凭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给人们以智慧的启发，给丑恶以无情的揭露。千百年来，它广泛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并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生活。特别在人们的世界观上，只要还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还存在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斗争，这些哲学寓言故事就仍然有它们的现实价值。岁月流逝，创造这些寓言故事的作者以及他们的由当时社会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被后人遗忘；但这些哲学寓言故事本身仍熠熠闪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所有时代的人类的共同财富。

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熔哲学和文学于一炉，是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的完美的结合。

哲学是逻辑思维，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和各种范畴

深刻地(有的是歪曲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它总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因而无论唯心或唯物,总包含着某些深奥的道理,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掌握。而文学则以形象思维为主。形象思维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根据作者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再加以集中的概括,塑造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一种优秀的文艺作品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往往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而抽象空洞、言之无物的枯燥的说教文章,则总是令人厌恶的。这种普通心理完全符合于人类认识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上升过程的客观规律。哲学寓言故事这种深入浅出、短小精悍而生动活泼的文学体裁,正是按照这种规律,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大量产生的。



哲学寓言故事在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寓言是譬喻的高级形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受到神话传说和民歌谚语的极大影响,同它们都有着渊源关系。

神话传说赋予哲学寓言以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马克思认为神话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是“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早在未有文字的氏族社会时代,民间已有神话传说的流传。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知识极少的情下,我们的祖先就通过大胆的形象创造出许多优美动人的

故事,表现出劳动人民对自然界顽强斗争的巨大毅力,表现出战胜困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比如人们熟知的“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和“刑天舞戚”等等远古神话传说,它们的浪漫主义精神和那种动植物拟人化和夸张性的手法,都为哲学寓言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创作方法、表现技巧和内容素材上的充分准备。有些哲学寓言故事就直接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庄子》开篇《逍遥游》所塑造的变化飞腾的鲲鹏就直接根据远古的一个神话;而他笔下出现的那个“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的藐姑射神人、以及使人爱其德而忘其形的怪人支离疏、叔山无趾、哀骀它等,几乎都是作者运用神话式的夸张手法所塑造的理想人物。先秦寓言中所出现的古皇氏名有几十个之多,他们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其他如“鹬蚌相争”、“三虱争肥”、“鸱鸺与腐鼠”、“土偶与桃梗”、“冒牌神君”等等的拟人化手法,也无疑是来自神话传说的。

这样,在吸取远古神话传说浪漫主义营养的基础上,哲学寓言故事便逐渐绽开了它那肥壮的绿叶。

至于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则是从民歌谚语发展而来的。最早的民歌谚语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吕氏春秋·淫辞》中记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謗,后亦应之”,在这种“吭唷吭唷”的劳动号子中萌芽的民歌,不仅反映出劳动者同自然界艰苦斗争的喜怒哀乐,而且在阶级社会中,又进一步传达出奴隶们深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和那反抗的怒吼。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辑录了许多从民间采集而来的歌谣，其中《国风》即是以民歌为主体的。在这些民间诗歌以及《左传》、《国语》等搜集的一部分民谣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的一般面貌。

劳动人民在徭役深重和被任意杀戮的灾难中，已经意识到阶级的对立，并悲愤地控诉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而当他们在非人的生活中，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便爆发出不可遏止的怒火：

“鹿死不择音，铤而走险，急何能择？”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在斗争中，他们意识到团结的力量，雄浑地唱道：

“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即使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他们仍向往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美好社会：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很清楚，这些民歌谚语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事物，针砭了社会的腐恶，有些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本质的现象。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哲学寓言的形成和发展。无论是先秦诸子以及两汉以后的寓言创作，都以针砭、讽喻现实作为最高宗旨。在封建社会中，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和压迫的丑恶现象，违背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的愚蠢举动，都在哲学寓言故事中得到了迅速的反映。作者善于抓住和突

出时代社会的症结所在，将寓言作为一种现实斗争的尖锐武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议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这种“会议”和“适时”，便是从政治的、社会的思想高度，以现实主义肯定了哲学寓言的价值。我们在“苛政猛于虎”、“社庙之鼠”、“舔痔得车”、“道学先生”、“嫁祸于鼯”等等故事中，可以洞见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实质。在任何时代，举凡违背客观规律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以及一切丑恶腐朽的现象，其本质都有共同之点，而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从本质上揭示了这种历史性的规律。哲学寓言故事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正是现实主义所赋予的。

## 二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还要借助于譬喻的手法来实现。

哲学寓言故事在一般譬喻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文辞简约趋于富赡，由哲理浅显趋于深刻，由缺乏人物情节而趋于故事完整的演变过程。

关于譬喻的出现，可以回溯到远古年代。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殷墟书契》的甲骨文卜辞中，我们就可以看见某些饶有韵味而引起人们一定想象的文字，可说是譬喻的萌芽。而后，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集的《尚书》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一些形象的譬喻。盘庚迁殷时教训臣民说的话：“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迓，其犹可扑灭乎？”用火势来比喻大势所趋，不可违抗，十分贴切而生动，成为后



人“星火燎原”这句成语的来源。其后，在“可以兴，可兴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三百”篇中，巧喻妙譬更是层出不穷，读之令人感到清新隽永。其中《豳风·鸛鳴》这首寓言诗，为寓言诗开了创作的先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诗经》之前，萌芽于殷周之际而相传“伏羲画卦，文王作辞”的《周易》一书，虽然内容不离卜筮迷信，但它强调“阴阳相推”，以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不仅在神秘主义外衣下蕴含着灿烂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而且观象制器，象征吉凶，往往取譬于具体事物，其中某些卦爻辞，如“羝羊触藩”、“窒井碎瓶”等等，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思想，词旨简练，哲理深隽，将它们看做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权舆，不为过分。可以说，我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初具维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较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伊索寓言产生的年代，还要早过五百多年。

然而，譬喻丰厚的源泉是在民间。古代劳动人民生息在奴隶主贵族的鞭撻之下，“不敢斥言”，只能使用巧妙的譬喻，委婉曲折而又辛辣尖锐地来宣泄埋藏在心底的抑郁和悲愤，一切耳闻目睹的事物，不管是硕鼠、黄雀，还是赤狐、黑鸟，都成了揭露统治者丑恶的寄托物；而荇菜、彤管和宓妃、佚女的比喻则表达了他们纯朴、率真、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对光明的热烈向往。在斗争中，他们的想象力大大地丰富了。

这一切，为哲学寓言的大量产生奠定了创造方法、表现技巧和思想内容上的坚实基础。当然，仅有譬喻，还不能精确地表达思想内容和哲理，因而需要将譬喻加以升华提高，

使之能更清楚完满地阐明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而满足这个需要的哲学寓言故事，在一定的时代和适当的社会条件下便象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

这个时代，便是风起云涌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大变革，引起了哲学、法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的自由研究和空前的学术繁荣，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的盛大局。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学派，在学术争鸣中逐渐倾向于用寓言故事写政治哲学思想，把它看做是一种战胜论敌争取群众的有效方法；而盛极一时的各国诸侯贵族们的养士之风，刺激了士阶层的兴起，亦大有助于这一倾向的发展。因为士人都以辩说进身，求取富贵，“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使得语言成为士人们用心研究的对象，“张仪的舌头”这个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在政治上还是一个分裂的局面，也没有正统思想和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尽可以放胆言论，而无后顾之忧。为了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通俗而广泛地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他们进一步在吸取民间譬喻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这几乎成了当时百家争鸣中的一种风气。而集中反映这种风气的，应该首先指出《庄子》这部书，它是一部古代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

《庄子》中有《寓言》一篇，全书“寓言十九”，“寓言”两字即始见于此。作者行文汪洋恣肆，想象瑰玮俶诡，用生动幽默的笔调，作深奥哲理的发挥，议喻交融，情文并茂，尽管是一部高谈玄理的哲学论著，而字里行间却充满着葱茏的生

活气息，给人以深刻的现实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他如《列子》（亦有人认为是晋人作品）、《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等，也大都具备这种风格和特色。

### 三

战国时期是寓言故事的黄金时代，其丰富与生动，成为先秦散文的一大特征。战国以后，寓言便很快衰微下去了。两汉有韩婴的《韩诗外传》、刘向的《说苑》、《新序》和刘安的《淮南子》等，对寓言有所承袭，但独创不多。魏晋南北朝笔记体文学和志怪小说开始发展，除在邯郸淳所撰《笑林》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书中可见一些寓言故事，以及随着佛教的兴盛，在佛经翻译中，引进国外部分寓言外，属于国人创作的已不多见。而唐宋两代则是诗词、散文的全盛时期，也少有寓言创作。直至元、明、清三代，戏剧、小说盛行，市井笑话倒是层出叠见，有些含有哲理的可视为寓言，但纯粹的寓言创作已是凤毛麟角了。

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同先秦以后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带来其他文学体裁的发展和丰富有关，但同历代帝王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尤有着直接关系。寓言故事既多为政治讽刺小品，其针砭的对象，从一介愚蠢的农夫，直至权力无上的君王，都一视同仁。其主题思想多是借小喻大，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此喻彼；这从反动虚弱的统治者看来，都不免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对他们不利的，因而也就绝不能见容于他们。古希腊奴隶出身的伊索用寓言讽刺权贵，终遭杀害；而在中国历代文化界，曾因文字

触讳而惨罹斧钺的人也比比皆是。

然而愤怒总是能够找到发泄的方式。元、明、清三代严格的或纯粹的哲学寓言故事固不多见，但它却同其他文学样式合流，杂于隐喻和笑话之中，以嬉笑怒骂的姿态出现了。在明初刘基的《郁离子》、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清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等笔记或笑话著录中，常有一些富含哲理、令人猛省的笑话，可视为哲学寓言故事的末流。

纵观我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发展源流，不能忽视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伊索寓言》所载“农夫折柴”和“蝙蝠”等故事，同我国南北朝《魏书》中的“国王折箭”、明代收编的“狡猾的蝙蝠”等如出一辙。特别是魏晋以后，佛教经籍经由印度大量地翻译到我国，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中有一则寓言故事“傀儡戏”，说有位工匠能制作“机关木人”，“能工歌舞，黠慧无比”，后木人覬觐王妃，使国王暴怒，匠人几被诛杀；故事情节同《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造倡”大致相同。《列子》成书之年与法护译经之年时间相近，两国之间究竟谁受谁的影响大，虽不能知，但中印古代文化的相互传习，可见一斑。另外，南北朝鸠摩罗什译的《杂譬喻经》和求那毗地译的《百喻经》，几乎都是寓言故事。鲁迅先生早就注意到印度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寓言的影响，他早年曾出资刊印了《百喻经》，并在《痴华鬘》（《百喻经》本名）题记中说：“常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尤其是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川大足宝顶等窟群采用雕塑、浮雕或壁画的经变形式，表

现出佛经故事内容，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其中如“投身饲虎”、“尸毗王救鸽命缘起”、“壶中人”、“相扑”等等，都以奇妙的构思和精湛的语言艺术，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而历代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前来中国转译佛经以及印度从中国回译他们失传的经籍，又为中西方寓言的交流、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盲人摸象”、“井中捞月”、“战马拉磨”等寓言故事几乎为中外人民所熟知。有关这一点，我们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同志能够深入探索一番，是很有意义的。

#### 四

这里，我们会产生一个疑问：哲学寓言故事这种古老的文学体式历千百年而不衰，即使在文字犯讳的严酷岁月，它仍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吐露褒贬；甚至有些哲学寓言故事流传几千年，打破了国家、种族的界限，成为论据性、经典性的结论，被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加以运用。它具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这样广泛的人民性，这是什么道理呢？下面，我们就概括地从古代哲学寓言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意义，它在历史上哲学两军对垒中的作用，以及它的艺术成就和对文学、语言发展的影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哲学寓言故事都从现实中产生，又反过来为现实、特别是为政治服务，这是哲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先秦是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发展的顶峰，这一情况便清楚地说明：社会激变和政治斗争的白热化，是孕育和繁荣这一文学体式的肥沃土壤。寓言故事从这个时期开始实际上

已成为政治斗争和哲学斗争中被自觉运用的武器，和那些神话传说、民歌谚语和譬喻等尚处于自发阶段的幼稚文学形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实际上开辟了古代暴露文学的阵地。

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分析这种情况：

战国中期思想家孟轲，被后世尊为“亚圣”。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民贵君轻”说，主张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为此他对当时的统治者的暴虐统治，作出了严峻的揭露和批判。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一个戴盈之，显然是宋国统治阶级的帮凶，他横征暴敛，遭到人民的谴责；但他明明不愿意取消“关市之征”（商贾所纳税），实行“什一税法”，却厚着脸皮许诺：“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孟子便讲了一个“偷鸡贼”的寓言，用诙谐而锐利的词锋，揭穿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玩弄的原来是如同偷鸡贼一般的诡计。

当时封建社会正在各国建立起来，制度虽已更新，但大批由奴隶主转化而成的封建地主采用的不过是“胠箝探囊”的伎俩，他们照样穷奢极欲，残酷掠夺，而民间则仍是一片“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庄子和孟子几乎是同时，深深地洞穿了这一实质，虽然在政治哲学上不免有某些消极悲观的成分，但在他那枝激情的笔端却喷发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之火。“泥涂曳尾”、“舐痔得车”等故事表达了他藐视权贵，宁居陋巷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精神境界。

在任何时代，人民群众始终把鉴别政治清平与否和君

主贤明与否的标准，归结到纳谏、用人和法治上。历代哲学寓言故事就有大量的篇幅是直接反映这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大凡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都具有这种可贵的作风。当然，他们的听言纳谏总为自己的阶级属性所局限，不可能触动其根本的利益，即使历史上最开明的君主如唐太宗，也不能例外。这在“谁是佞人”和“法琳念观音”的故事中可窥见一斑。

统治阶级为了欺骗人民，开脱自己的罪责，总是把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原因推到外界事物如自然灾害和动植物上；“国有三不祥”这个故事中说到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便惊恐万状，认为是不祥之兆。晏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国家的确会有不祥之兆的，而且有三不祥，但不是那些外部事物，而是：“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把国家兴衰原因归结到内部因素即使用人材的问题上，这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历来形成两种尖锐对立的用人路线。人民痛恨那种“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的不合理现象，向往那种人尽其才、用得其所的政治。这种强烈的情绪在寓言故事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既有“举人不避亲仇”、“伯乐相马”、“毛遂自荐”、“如鱼得水”等千古流传的美誉，也有“千里马拉盐车”、“扁鹊投石”、“爱好丑恶的人”、“纸上谈兵”等无情的鞭挞。

是法治，还是人治，这个长期对立的两种政治主张在寓言故事中也得到尖锐的反映。包拯、海瑞、况钟等不附权贵、执法如山的清官一向传为美谈，而在寓言故事中也有“腹髯

斩子”、“申子请罪”、“私恩与公法”等等。其中有一个“李离伏剑”的故事，大意是：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典狱长官。有一次，他发现一起错判死刑的冤案，便要求晋文公将自己处死。晋文公执意不肯，李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晋文公在春秋五霸中尚属一位开明的君主，但他也认为刑罚的轻重应按官职的高低来定，也就是说，官职越高的人就可以越不受法律约束。李离否认了这一点。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第一，他以自己的生命来体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严肃性；第二，他敢于负责，认为既然自己掌握的权力最大，享受的待遇最高，并且也从不分润给下属一点，因而有了错误和罪责就没有丝毫理由推给下属。这两点至今仍不失其重大的教育意义。当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寓言中会出现这样多的故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现出纳谏、用人和法治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呢？这在外国寓言故事中确是不多见的。实际上，这反映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特点。在长期的封建官僚主义统治下，社鼠城狐肆无忌惮，而人民群众却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他们在污浊沉闷的黑暗中喘息，对民主和光明的要求格外强烈。他们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只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个贤明的君主上，因而在寓言故事中倾注了他们的劝喻、讥讽和愿望，这也就磨砺出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生命力中光彩耀人的一面。

在探讨古代哲学寓言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寓言的政治含义也在



发生不断的变化。例如在“冒牌神君”这则寓言中，韩非笔下的大蛇小蛇，为了在新的情况下求得生存，不但打破了大行小随的老规矩，而且敢于让小蛇骑在大蛇身上，这是作为法家的作者对当时奴隶制等级制度的大胆挑战和示威，表现他蔑视“君臣父子”的陈腐观念，勇于革新的战斗精神。但是后世在加以运用的时候，却用“冒牌神君”来教育人们要善于透过假象，看清本质，揭露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欺骗行径，这可能不是韩非始料所及的吧？还有一些寓言如“斥鷃笑鹏”、“皮为之灾”、“齿亡舌存”等，后来使用意义同作者创作意图都有所变化，或歧义，或发展，或相反，这种现象同寓言故事本身的哲学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有关。

## 五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哲学寓言故事在历史上哲学两军对垒中的作用。

在哲学上，从来贯串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真正的有机的结合，还是一个难产过程，倒是在不少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内往往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是一方面。同时，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开，而是在不断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着；唯物主义固然在斗争中发展，唯心主义又何尝不然？这是又一方面。根据这两种情况，提到哲学寓言故事的角度来看，有下列几点值得从例证中加以注意。